

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

卷五

專著

中國國民黨
中央委員會
黨史委員會
恭印



總統
蔣公思想言論總集
卷五
專著

中國經濟學說

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 卷五 專著

目 錄

中國經濟學說·····	一
一、中國經濟學的定義與範圍·····	二
二、中西經濟學說的分列·····	八
三、中國古來的經濟規模·····	一六
四、民生主義的經濟的道理·····	二四
五、將來的經濟理想·····	三三
附錄一、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意義及其實施·····	三七
附錄二、土地國有的要義·····	四五

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 卷五 專著

中國經濟學說

——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十日在重慶發表——

一、中國經濟學的定義與範圍

甲、緒言

乙、中國經濟學的定義與說明：子、經濟學的定義 丑、經濟學的本源與範圍

寅、經濟學的目的及其哲學文化思想之關係

二、中國經濟學說的分列

甲、中國古來的經濟學說 乙、西洋的經濟學說及其最近的趨勢

三、中國古來的經濟規模

甲、國家養民的本務 乙、國家保民的本務

四、民生主義的經濟的道理

甲、民生主義的基本原則 乙、幾個學說的缺點 丙、實業計劃的意義

五、將來的經濟理想

一、中國經濟學的定義與範圍

甲、緒言

近百年來，中國經濟受西洋工商業的影響，發生了歷史上最大的變化。在這個變化歷程之中，一般人要研究西洋的工商業的組織，當然也要研究西洋的經濟學說。因此，西洋的經濟學說，便流行到中國的學者和社會裏面，而以正統派經濟學說與馬克斯經濟學說為最盛，中國自己的經濟的原理反而沒有人講求。今天如果我們提起中國的經濟原理，一般人一定不明白。他們不獨不明白，還有些人各自拘泥於他們平日所信所學的西洋經濟學說，對於中國固有的經濟學說，就是經濟的道理，亦未必能瞭解，更未必能接受。

社會上流行的經濟學說，所以不能夠遠承我們中國古來經濟學說悠久的淵源，近考我們中國經濟變遷的實況，預察我們中國經濟發展的前途，並樹立經濟的理想，以為我們經濟建設的歸趨，其原因在於百年來我們中國久處於不平等條約束縛之下，一般學術思想界都養成了捨己耘人，重外輕內的傾向，而

經濟思想界更直接的受了次殖民地經濟現狀的影響，因而喪失了獨立自主的精神，沒有創造發明的魄力。經濟最發達的區域在於條約的商埠尤其在於外國租界，經濟學者研究的對象，也偏於條約商埠尤其是外國租界的工商金融事業。條約商埠和租界的工商金融業，既附庸於外國的工商金融事業之下，所以經濟學者，只知道襲取外國的成說，却忘記了我們中國自有悠久的歷史進化，自有特殊的地理環境，自有立國的經濟規模和理論，這是很可痛心的事情。現在我們經過五十年國民革命的奮鬥，六年來抗戰的犧牲，已經把不平等條約撤廢了。只要我們全國國民繼續以最堅毅的精神，最艱苦的努力，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，我們的中國就是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。我們的經濟建設，就可以依據獨立自由的計劃。所以我們在這個時機，要研求獨立自由的經濟計劃，更要樹立獨立自由的經濟思想。還要知道，社會流行的經濟學說，只是一意襲取西洋的成說。殊不知西洋的經濟學說以西洋的經濟狀況為依據，而西洋的經濟狀況，有不斷的變化。最重大的變化，就是自第十九世紀進入了第二十世紀，歐美工商業的自由競爭轉為獨佔與集中。此種趨勢，在第一次大戰結束後，愈益顯明，國父稱之為第二次工業革命。至二十年後的今日，第二次大戰爆發發起來，規模更大，變化亦烈。世界的經濟又到了急轉的關頭，我們在這個時機，對於中西經濟學說應當重新檢討，為中國的經濟建設與世界經濟的改造，得一條光明的道路。

乙、中國經濟學的定義與說明

子、經濟學的定義

從人與物的關係來說，中國稱經濟學為「經世濟物之學」；從個體與全體的關係來說，中國稱經濟學為「國計民生之學」。我們可以說，經濟的原理，就是經世濟物的道理，亦就是國計民生的學理，簡言之，經濟學即致國家於富強之學，亦就是建設國家臻於富強康樂的境域。簡言之，即「建國」之學。所以中國經濟學的範圍，比西洋經濟學的範圍要廣得多。

丑、經濟學的本源與範圍

天地萬物都有其構成與存在之理，所以詩經說：「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則人。」為萬物之一種，亦有其所以為人之理，人所以為人之理，稱為人性。人有求生之欲，與一般生物相同，而人有能思之心，則為人性之特質。書經說：「人為萬物之靈」，即指能思之心與由此心所發生的思慮與理性作用而言。中國的經濟學說，無論是儒家是法家，都討論人與物的關係，而其討論都以人類的理性與人類的欲望的關係為中心，儒家求理性之擴充，法家主欲望之制約。儒家注重理性，故其學說之本源為仁愛。法家注重欲望，故其學說之本源為法度。這是兩家的分別。然而儒家的仁愛，是就人類的理性而言，法家的法度，是對人類的欲望而言。儒家之所欲擴充者為理性，法家之所以要制欲者亦為理性。所以中國的經濟學說以理性為本源，不以欲望為本源。

天地萬物在宇宙之間，各依其所以構成與存在之理，而各有其地位。我們如果體認此理，便可以使萬物各得其所。這就是中庸所說的「致中和，天地位，萬物育」的中國哲學正統思想。依於這個思想，人不是彼此分離的個體，個體的小我是大我的一部分；物亦不是彼此分離的物質，任何事物都是全體的

一部分。人與物的關係須從大我與全體的法則（理）裏面來觀察來處理，故中國的經濟學不以一個人或一個物為本位，乃是以人類和社會的全體為本位，與西洋各派經濟學說截然不同。

寅、經濟學的目的及其哲學文化思想之關係

就生產要素而論，西洋經濟學舉出資本、勞力、土地之三者，並認此三者為三種之物質而觀察而處理。我們中國的經濟學說，對生產要素則從人的方面來講求。大學說：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財，有財此有用。」這句話，有兩層意思：淺一點說：生產的要素是人力與土地，以人力開發土地，纔有物資，纔有財用。所謂物資，包含直接從土地生長出來的農物和鑛產物，間接從農鑛產物加工而成的工業品兩類。中國的經濟原理：不列貨幣為生產要素。中國的經濟學說，認為物資不過是人力與地力的產物，而貨幣只是物資交換的一種媒介。故貨幣的本身並不能夠成為生產要素的一種。

深一點說：人之所以為人者，在其有求生之欲，更在其有能思之心。人與一般的動物不同，能以思慮與理性指導其求生的活動。故人力有體力與智力兩種。人能以智力運用其體力，所以人的生產技術有不斷的進步，而其他動物的生產技術只限於他們的爪牙。在人類社會之中，從狩獵畜牧的弓矢，漁夫釣撈的網罟，農夫耕耘的耒耜犁耙，以至於現代工業用的蒸汽電氣機械，都是人力智力所發明。此種發明及其根據以為發明的自然科學，是人類能夠增進生產效能的一個重要條件。

其次，人之所以為人者，在其能合羣。人沒有一般動物所有的爪牙，而人可以戰勝一般動物，獨有優美的生活，是由於人有合羣之性。人所以能合羣而不爭不亂，又由於人有思慮與理性作用，以發展人

羣的組織。人羣最高與最大的組織是社會和國家，社會和國家之力，更大於構成社會國家的個人力量之總和。個人的力量亦惟有在社會國家的羣力之內，纔可以得到最大的發揮。離開了這個最高與最大的人羣，個人便沒有生存的可能性，更沒有發揮其智力與體力以增進生產的可能性。此種組織以及其依此發展的法則，是人類能夠增進其生產效能的又一個重要條件。

我們可以說，離開了自然法則與社會法則（即物理與倫理），不獨人的生活為不可能，亦且失去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（人性）。此依照自然與社會的法則的生活方法，稱為文化。一般動物不能體認此種法則，換言之，不能體認宇宙間本然之理，以改進其生活。只有人能夠體認宇宙間本然之理，故求生的活動便構成了文化的活動，而有不斷的進步。一切發明與創造都是宇宙間本然之理的實現。中國人崇拜的古代帝王和聖賢，沒有一個不是能夠體認宇宙間之理而有發明與創造，以改進人民的生活的人。五千年來，創造網罟耒耜的伏羲、神農，發明文字與弧矢的倉頡、黃帝，中國人都是一樣的崇拜他們。要知道這些制作，都是為了改進人民生活，使其一步一步達到理想的境界，所以他們受後世的崇拜。如果離開了人民的食衣住行，來談文化，以為生活之外還有文化，或竟以一知半解的寫作為文化，未免輕蔑了文化。在中國的經濟的學說上，文化與民生是一體不可分的，民生之外無文化，文化之外亦無民生。

剛纔說過，社會國家是最大最高的人羣。在中國廣大的土地上面，從古以來，論生產不過是手工業農業，論交通不過用人力獸力，仍然生長一個偉大的民族，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。這不能不歸功於我們的前賢和先民「經世濟物」與「國計民生」的學問之高深。我們看一看古來大政治家大經濟家，對於理

性與欲望之間的思辨，對於國家與人民之間的調理，對於文事與武備之間的配合，何等精密，何等周詳？其中最基本的學問和規劃，是求國計與民生的合一。在中國的經濟的學說上，國家的任務，一方面是養民，一方面是保民。就養民而論，國計就是民生；就保民而論，民生就是國計，簡單的說，就是國防，而其最精之一義即在於民生與國防之一體而不可分。由中國的經濟學的意義來看西洋的經濟學，只不過是一種私企業學，或是市場交易之學。我們中國的經濟學的對象不止於私企業或市場上的交易過程，而是民生與國防的統一體。由這個統一體來說，民生之外無國防，國防之外無民生。

綜括上面講述的話，我們知道中國經濟的道理，是從宇宙的大我與民族國家的全體，來觀察並處理人與物的關係，是以理性來指導人類求生的活動。根據這個道理，我們再來尋繹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財，有財此有用」的意義，就可以明瞭經濟學的目的。

就生產的要素而論，中國的經濟學指出人力與土地，由人力開發土地以有物資。經濟學的目的，在最小的時間與精力，發揮此三者的效能，至於最高度。國父說「人盡其才，地盡其利，物盡其用，貨暢其流」，就是說我們要發揮人力、土地與物資的效能至於最高度。而發揮人力、土地與物資的效能，有法則，有層次，有目的。在法則的方面，我們知道宇宙間萬事萬物有其構成與存在之理。此理在於特定事物者，稱為此一事物之性。我們要發揮人力地力與物資的效能至於最高度，必須依照人與土地物資的本然的法則（即本性）。我們要依照其本性，以發揮其效能，必須認識其本性。所以中國的經濟學說，以為我們要盡人力與物力，必先「盡人之性，盡物之性」。在層次的方面，我們知道中國經濟的

原理，是推人以及物。孟子說「仁民而愛物」。中庸說「能盡人之性，故能盡物之性」。我們盡地力，必先認識人性，並發揮人性，至於最高度。人性的認識與發揮，最重要的方法有兩種：第一、是承繼民族固有的倫理，恢復民族本然的智能。第二、是趕上西洋進步的科學，運用西洋最新的技術。這樣纔可以盡物之性，因而盡物之力。在目的方面，我們用最小的時間與精力，本於文化的遺傳，依於進步的科學，發揮人力與物力至於最高度，為的是民生的改進與國防的充實。換言之，我們的經濟學，以養民與保民為目的。申言之，西洋的經濟學說，以欲望尤其是個人小己的欲望——私欲為出發點，充其所至，生產技術與國防技術，不獨不能為民生服務，反而役使民生，甚至於毀滅人性。中國的經濟學說與此不同，我們的經濟學說以人性為出發點，以民生為目的，一切經濟制度與政策，都要順應人性，服務民生。孟子說「仁民而愛物」，最為切至。我們要為了人民，而愛惜物力；為了人民，而發揮物力。人民需要國家來保養，所以國家以最小的時間與精力，本於文化的遺傳，依於科學的方法，發揮人力地力與物力，至於極高的限度，用之於民生與國防，這就是經濟學的目的。

二、中西經濟學說的分別

甲、中國古來的經濟學說

上面說過的中國經濟學的本源與目的，是我從中國各派共同的學理裏面抽繹出來的要旨。我們中國

古來的經濟學說，原不止於一派。凡是健全的理論與政策必適合於一個民族國家的自然環境、地理、氣候、歷史與民族精神、社會狀況。所處的國家不同，所遇的時代不同。則學說自有不同。古人說「卽物窮理」，又曰「因時制宜，因地制宜」。就是說理論與政策必須適合於時代，適合於環境，不能夠一成不變。中國古來的經濟學說有派別，有流變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遠在三千年前，周族從黃河上游向河淮江漢的流域發展，農工商業逐漸繁榮。這時候，我們中國產生了一位偉大的經濟家，就是周公。周禮一書的著作與時代，古今學者雖辯說紛紜，未能確定，但其中多可考見為周制；更證以詩經裏面，七月之章，大田甫田之什，以及孔子孟子稱述周制的言論，都足以使我們想見周代立國以井田制度為根本，不獨兵制基於井田，卽庠序的制度，亦基於井田。我們可以說，文化、民生與國防合一的立國規模，創自周公，亦非過論。周公之後五百年，中國的農業很有進步，商業也發達起來。這時候，井田制度已經破壞了，周公的學說也湮沒了。農商之間，互為影響，發生各種問題，而學術思想也分出許多的流派。自春秋時代，管子、計然、白圭諸人，下至於戰國時代的百家，對於這些問題，都有討論。最重要的學派裏面，儒家與法家雖都認農業為本業，而對於商業的政策，兩家主張各有不同。孟子荀子都主張「關幾而不征」，是一種放任主義；管仲商鞅都主張管制商業，平準物價，是一種干涉主義。這種爭論直至西漢時期，「鹽鐵論」作成有系統的紀錄，可以與一千八百年之後，歐洲重商重農兩派的爭論作一個比較。

西漢以前，我們中國的經濟思想與制度政策，漸統一於儒家之下。在儒家的內部又分為兩個派別：

一派偏重於性理之學，一派偏重於功利之學。如北宋的張程（張載、程顥、程頤）一派即偏重性理，三蘇（蘇洵、蘇軾、蘇轍）一派即偏重功利。南宋的朱（熹）陸（九淵）偏重性理，陳同甫（亮）葉水心（適）偏重功利。但是歷代的大經濟家，都綜合性理之學與功利之學而成為系統，並且兼取儒家之說與法家之說而得其會通。如宋之范文正（仲淹）王荊公（安石），明之王陽明（守仁）張江陵（居正）都是理論與事功兩者並茂的大經濟家。

現在再就各派裏面，特別提出幾家來說明一下。春秋時代，齊國的魚鹽鐵器蠶絲等業都很繁盛，故齊國商業的力量，在國內操縱農民的生活，在國外支配黃河流域。這時候便有管子的學說，對於農商關係，價格問題，統制政策，國營事業，兵農制度，有詳明的討論。管子認為生產要素只有人力與土地兩種，而尤以人力為本源。八觀篇說：「民非穀不食，穀非力不生，地非民不動，民非力作無以致財，天之所生，生於用力」，這與大學所說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財，有財此有用」是一樣的說法。管子對於農商的關係從價格問題着眼來求解決。黃金是人民交易的手段，穀米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，金多則物賤，金少則物貴；穀貴則物賤，穀賤則物貴，物賤則傷貨，金少則傷事；穀貴則傷民，穀賤則傷農。管子的政策是國家要使金與穀的價格得到平衡，始可以平衡一般的物價，而求金穀的價格平衡，又必須取締屯積而暢其流通。為達物價平衡的目的，金與穀必須操於國家之手，而不可以操於豪強之手，物貴則緊縮金幣，穀貴則平糶穀米，如此則萬物可以流通。為使國力增殖而民生不受豪強操縱，管子主張國家獨佔鹽鐵及山澤之利，並統制國外貿易。這種專賣政策與統制政策對於後世，有很大的影響。管子對於

兵農問題，有名的政策是「作內政以寄軍令」。自井田制度破壞以後，土地分配漸趨不均，故兵農亦漸趨分化，管子乃用這個政策編制農民，教以軍事，使齊國舉國皆兵，而民生與國防更打成一片。商鞅的「農戰」政策，即以管子為本，用於秦國，秦的軍隊竟能統一中原。這個政策對於後世的影響更大。

在西歷紀元前六世紀，中國已產生管子這樣的大經濟家。管子以後，經濟學說歷代都有名家，經濟制度與政策，歷代都有變易。在第十一世紀之時，中國從二百年藩鎮割據之中，重新建立大一統的國家（宋代）。土地的兼併，商業的發達，財政的困難，外患的侵逼，各種問題性質的嚴重，規模的宏大，遠在春秋時代的齊國之上。這時候，范仲淹首先主張改革學制與科舉，對於青年，要「教以經濟之業，取以經濟之才」。王荊公繼范氏之後，實行變法。他的學說是本於孔孟相傳的經學的，他說：「經術正所以經世務，但後世儒者大抵皆庸人，故世俗以為經術不可施於世務」，這就是說經學就是經濟之學。不過經濟的施設，必須依「所遭之變，所遇之勢」而定，故後世對於經學，只可以法其意，不可拘泥於其跡。他有這樣的見地，故與尋常的儒家不同。尋常的儒家多注重於節用，他獨注重於增加生產，即所謂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，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」。他的政策以農田水利為本，更進而裁抑兼併，平均賦役，周轉農本，使人盡其力。他對於國內商業，取締團行與邸店，實行所謂「市易務」與「免行錢」等辦法，使一般商販，不受壟斷，而後商品可以流通。他對於國外貿易，也與一般儒家不同，當時有一個傳統政策，禁止銅錢出口，因而對外貿易在沿海沿邊受極大的限制，他排除眾議，解除銅錢出口之令，獎勵輸出入，以增國富。他對於國防，力主農兵制度，而從保甲着手，使國民受軍事訓練

，而期於舉國皆兵。

第十六世紀之中，明代開國的法度已壞，土地兼併，賦役不平；衛所的屯田廢弛，外患的侵凌益急。這時候，中國又有一個大經濟家，即張江陵。他的學說綜合性理之學與功利之學，且儒法兼用。他說：「學不究乎性命，不可以言學，道不兼乎經濟，不可以利用。」凡是實學，必可以實用，而實學必貫通性命與經濟。他為政的要旨是「實事求是而不采虛聲，信賞必罰而真偽無隱」，是「采其名必稽其實，作於始必考其終」，簡言之，即「循名覈實，信賞必罰」。他的目的，是富國強兵，一般儒家批評他的政策是「霸道」，他說：「孔子論政，開口便說：足食足兵。舜命十二牧曰：食哉惟時。周公立政：其克詰爾戎兵。後世學術不明，高談無實。剽竊仁義，謂之王道；纓涉富強，便云霸術。不知王霸之辨，義利之間，在心不在跡。」我們要知道仁義與富強之道，本是一體。順乎人性的富強之術就是王道，反乎人性的富強之術就是霸術，以義為本就是王道，以利為本就是霸術，所以說「在心不在跡」。江陵本於這個道理，抑制兼併，丈量田畝，平均賦役，開通商務，整飭兵制，都有盛大的功績。

這些大經濟家的理論各有不同之處，但論其本源與目的，莫不脈絡貫通。他們都不以人類的欲望為出發點，尤其不以個人之小己的私欲為出發點。他們的學說都本於人性，他們的目的都是國計民生，都是為國計民生而致力於經濟的規劃與統制。

他們的政策也隨時代的變遷而有不同，但其間仍然有一貫的脈絡。他們的政策都以土地問題為中心。他們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案，又都從農工關係和農商關係上着想。商業的壟斷居奇與土地的兼併，是相

通而相因的現象。土地兼併不獨影響國家的財政和人民的生計，亦且影響兵役和兵制，因而影響到國防。所以我們的國父在同盟會時代，就提出「平均地權」政策，足見得我們中國的土地問題，在各種經濟問題中的地位的重要，也足見得土地政策是各種經濟政策裏面的根本政策了。

乙、西洋的經濟學說及其最近的趨勢

西洋的經濟學說不止是一個系統，各國的自然環境、地理、氣候、歷史與民族精神、社會狀況，各有不同，各國的經濟學說也不一樣。西歐在第十七第十八世紀時期，中古的農業經濟轉為近代的商工經濟，於是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兩派經濟學說先後興起。重商主義者主張國家取干涉政策以保護商業，振興工業；重農主義者主張國家取放任政策，而以農業為唯一之生產事業。重商主義重視貨幣，重農主義重視物資。至第十八世紀與第十九世紀之間，西歐的工業革命完成，其時英國學者亞丹斯密綜合兩派而著「原富」，風靡歐洲，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說盛極一時。到了第十九世紀中葉，德國的經濟思想便自成一個系統，李斯特的「國家經濟學」，反對亞丹斯密的個人主義，而主張國家主義；反對亞丹斯密的放任政策，而傾向於保護政策，第二世紀初期，斯密的「經濟學的基礎」等著作，更使德國的經濟思想轉入全體主義的一路。美國的經濟思想與英國同其本源，然而美國經濟學說對國際則採取保護政策。對國內則傾向於計劃經濟。此種傾向至第一次大戰以後，更加有力。祇有英國還保持亞丹斯密的系統，而其中也有不少的變遷。在十九世紀之內，李嘉圖的「經濟學與租稅原理」影響比「原富」更深

。二十世紀初期以來，馬爾薩斯數理學派代亞丹斯密與李嘉圖的學說支配英國的思想界。霍布孫一派的福利經濟學更漸臻於昌盛。馬克斯經濟學自命是由正統派經濟學轉變而來，然其思想方法乃是德國的思想主義的產物，與英國的經驗主義，淵源各自不同。列寧的學說以馬克斯為宗，而其對於政治經濟的理論和政策，與考茨基竟有天淵之別。俄國革命的前後，列寧與考茨基之論戰，亦即為馬克斯學派之內，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民主主義的論戰。由此可見德俄兩國的馬克斯主義者持論也各有差別。

西洋的經濟學說雖派別紛歧，但考其本源，仍有相同之處。他們無論那一學派，總以個人的欲望為出發點，以推論經濟現象而構成其學說的系統。以亞丹斯密「原富」為開端，西洋的經濟學派聚訟的中心問題，就是價值問題。亞丹斯密以為社會是多數個人的集合，此多數的個人各為市場上交換價值而生產，各持其所生產的交換價值而自由交換於市場之中。貨幣即是市場上各種商品的交換價值的表現，社會經濟不外乎無數的交換過程。故經濟學乃是價值學說，亦即是多數個人之間的交換關係的學說。馬克斯的「資本論」雖為「原富」的反對論，仍然以商品的價值分析為出發點。他以為資本主義社會是商品的集合，而商品是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矛盾的統一。他的學說仍然不出於價值學說的範圍。我們再看西洋的經濟學，論價值的本源，雖有各種的說法，而總以人類的欲望為依歸。第十九世紀之末，奧大利學派倡「邊際效用說」。這一派的學說以為商品的價值，是由人類對於商品的欲望而來。例如從一個饑餓的人看來，第一碗飯的價值大於第二碗飯的價值，第三碗以上的飯的效用，便到邊際，而價值也相隨減少。他們由這種淺顯的原則，推論價值的本質。這派學說，後來流行於美國。第二世紀初期，美國